

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

学术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

学术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 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李媛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
ISBN 978 - 7 - 5010 - 2485 - 8

I. 俞… II. ①北…②中… III. ①俞伟超 - 1933 ~ 2003 -
纪念文集②考古学 - 中国 - 文集 IV. K825.81-53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250 号

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市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29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2485 - 8 定价：180.00 元

目 录

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代序)

——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评述 (1)

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

——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张爱冰(14)

楚文化渊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怀念俞伟超先生 杨权喜(30)

类型学的类型

——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的检讨 汤惠生(39)

“系列样品”的考古质疑 蒋祖棣(66)

科技考古概述 杨 林(85)

三大区交汇与中国文明起源 郭大顺(96)

中国数字的产生与文字的起源 葛英会(108)

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

——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分析与研究 裴安平(127)

试论班村遗址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 张居中(157)

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的再分析 于海广(164)

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祭祀和随葬的研究 袁 靖(175)

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 李水城(193)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夏商考古学文化研究摭拾 杨育彬(203)

从夏聚到商城

——垣曲古城南关夏商聚落演变试探 佟伟华(213)

商汤伐桀经行路线新探 郑杰祥(227)

“虎食人卣”及相关图像的史影蠡测 陈星灿(232)

夫豷申鼎、自余钟与卣子受钟铭文研究 李家浩(241)

周原考古札记四则	刘 绪(254)
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	雷兴山(263)
试论周代棺槨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	高崇文(276)
试论中国昭穆制度的起源	李如森(287)
从山东小邾国的考古新发现谈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四	曹兵武(296)
晋都新田的年代和布局	梁 云(302)
汉代京城、帝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焦南峰(317)
尊者无形:秦汉陵墓随葬人俑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赵化成 虞丽琦(344)
胡汉战争画像与胡汉战争	于炳文(354)
中国早期佛像的重要发现	
——论重庆新发现的纪年钱树佛像	罗二虎(376)
匈奴、鲜卑的金属饰牌	乔 梁(386)
中国古代的徒刑及刑名的演变	南玉泉(402)
日本古代的大王陵园与国造墓园	茂木雅博 著 信立祥 译(410)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服饰研究	陶正刚(422)
日藏入华粟特人石床榻舞蹈图	张庆捷(436)
郑和捐抄《妙法莲花经》手卷调查记	林梅村(448)

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代序）

——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评述

2003年12月5日，我们敬爱的导师——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著名考古学家、教育家俞伟超先生走完了他70年的人生旅途，怀着对一生钟爱的考古文博事业的憧憬，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家的杰出代表，俞伟超先生为新中国的考古文博事业奋斗拼搏了整整半个世纪。他从选择投身考古文博事业的那天起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坚定虔诚地奉行着自己“我们必须听从生命的召唤，必须不断地往前走”^[1]的人生原则，热情激荡地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为新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思考。他生前出版的一部专题考古发掘报告、一部学术专著、三部学术论文集^[2]及发表在中外各种报纸杂志上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就是他在半个世纪中为新中国考古文博事业艰苦拼搏、探索和思考的结晶。其研究范围之广，学术价值之高，使俞伟超先生成为中外公认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和天才的中国考古学巨擘。

在全国考古文博界同仁都在深切缅怀俞伟超先生的今天，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总结他的学术贡献，无疑对我国考古文博事业今后的发展和学术后辈的成长都大有裨益。

—

作为新中国的考古学骄子，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当然主要在考古学方面，后来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才涉足于博物馆学和文物学。仅就考古学而言，俞伟超先生研究的范围，上起旧、新石器时代，下迄唐宋，专攻战国秦汉考古，始终醉心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而且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上都卓有建树，自成一家，这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家中，是罕有其比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对此感触颇深，曾多次对笔者说：“如果要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考古学》，俞伟超无疑是最合适的作者人选。”俞伟超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田野考古实践是近代考古学的生命。像一切杰出的考古学家一样，俞伟超先生是沐浴在田野考古实践的泥土芳香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而且终其一生，乐此不疲，无

怨无悔。1954年他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就带着充满童稚的幻想和青年的激情一头扑进了田野考古工地。至1960年止,他先后参加了半坡遗址、白鹿原唐墓群、秦阿房宫遗址、西周沔西遗址、黄河三门峡古栈道遗迹、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宋金墓群和春秋虢国墓地、河北临漳邺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当他的第一部专题考古调查报告《河南三门峡古栈道的勘察》出版时(1957年),他年仅25岁。这种考古实践情结老而弥笃,不知老之将至。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使俞伟超先生的考古学研究一直充满着泥土的清新和活泼的生机,而绝没有书斋学者的沉沉暮气。

但是,俞伟超先生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巨擘,绝不仅仅缘于他的考古学田野实践。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所言:“仿佛(考古学)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3]俞伟超先生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考古学思想家。在从一个青年考古工作者到考古学思想家的攀援过程中,俞伟超先生经历了一次次对自己的扬弃和否定。这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其中既有曲高和寡的寂寞,歧路迷茫的困惑,也有缺乏理解的苦闷。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定不移地攀登着,终于到达了辉煌的顶点。

这一攀援过程,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基本上与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对应,因此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俞伟超先生的成功。而其攀援的目标,则是考古学科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

在俞伟超先生学术活动的前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笼罩在前苏联机械唯物论考古学的全面影响之下,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被局限于考古遗物,将遗物的分期断代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而作为考古学断代依据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受到高度重视。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俞伟超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苏秉琦,受到了地层学特别是类型学的严格训练,这使他终生受益匪浅。从20世纪50至60年代初俞先生所发表多篇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当时中国的考古学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与这种机械唯物论学术思想格格不入的。1958年,北京大学围绕着考古学的目的论问题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潮进行了一场大批判,将考古学的目的定位到科学研究历史的轨道,从指导思想实现了考古学向历史学的回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俞先生进行了他学术生命中的第一次攀援,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第一次升华。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解释和复原历史;考古学中物与物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即古代的社会关系,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思维抽象出这种隐藏在物后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各种制度即历代的“礼制”上。从此,他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的制度 and “礼制”上。而要进行这种研究,就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深刻的历史认识。为此,他花费了数年时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有关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著作和郭沫若、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历史学著述。而“文革”的炼狱磨难,又使他彻底摆脱了生死荣辱的困惑,进一步

净化了学术思想。思想方向一经确定，研究成果便喷涌而出。从1963年发表《秦汉的“亭”、“市”陶文》^[4]起，至1988年，共发表有关先秦两汉礼制和社会制度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其中，1984年发表的为《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写的“编后记”^[5]和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6]一书，可以看成是俞先生前期学术经历的总结。前者反映了俞先生对苏秉琦构建的“区系类型”考古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后者论述了我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形态变化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搜集资料到问世，历时达30年，凝聚了他半生的研究心血。其几篇主要论文，如《周代用鼎制度考》^[7]、《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8]等一经发表，学术界立时为之震动，人人争睹为快，致有“洛阳纸贵”之叹。一个天才学者型的俞伟超像一颗璀璨的新星，在中国考古学的天幕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时如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形成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种强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考古界困惑了，俞伟超先生困惑了。为了摆脱困惑，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生俱来的锐意进取性格，使俞伟超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学术思想攀援。与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时他不过是众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现在却是攀援队伍的主帅，集成败功过的历史责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次历时近十年的漫长、痛苦而危险的攀援。为了寻找攀援的途径，他组织人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二战后考古学、人类学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并通过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较对这些学术思潮进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一过程中，他著文重点介绍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考古实践中进行了检验。顿时，误解的批评、冷峭的责难接踵而来，似乎他成了新考古学派在中国的总代表，这使他倍感孤独和寂寞。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息哲学的思考，放慢攀援的节律，他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深沉的语调自慰说：“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诗人注定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终于完成了这次脱胎换骨“涅槃”式的攀援，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再一次升华。

通过对考古学目的论的思考，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9]对考古学的方法论，他指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还应该科学的文化论；他提出了考古学“大文化”的概念，认为“古文化就是物质、精神加上社会的复合体”，考古学研究应该从“社会的、意识的、物质的、技术的等等”^[10]多视角出发，通过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了解和发现人的本质即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过程。他极为重视对考古学文化中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从考古遗存来探索古文化的精神信仰，当然非常艰难，但这却是古文化的灵魂”^[11]；极为重视先进自然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结合，提倡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与研究，并力图以此去揭示人与自然的制约关系；他从驾轻就熟的类型学中总结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用于研究各考古

学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影响和交流。他学术生涯后期从多种视角、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写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到庄严神秘的祭祀,从中原正统文明的发轫繁荣到四裔文化的成败兴衰,上下古今,议论风发,想别人所不敢想,发旁人所不敢发,文采风流依旧,却平添了深厚的历史感和哲人的睿智。俞伟超先生成功了,他实现了从考古学家到考古思想家的升华。

时代造就了俞伟超,但他成功的关键却在于他优秀的天才素质。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勤奋,多做、多读、多思、多写,他一生持之以恒。二是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涉者,从来不把自己视野的终点看成是世界的终点,一生都在追求学术研究的更高层次和学术思想的更高境界。三是多幻想,他的诗人和艺术家气质使他在研究中经常突发奇想,著文立论新奇大胆,发聋振聩,他深知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在幻想之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四是敢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很明显,这四点都是后天对素养和情操长期磨炼的结果,是任何一个学人经过训练和努力都可达到的。俞先生成功的学术道路,正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二

俞伟超先生是我国战国秦汉考古学体系的主要奠基者,并为逐步完善这个体系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是从这一领域发轫而且最大贡献也集中在这一领域。尽管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但直到晚年,他仍然自谦地说自己是搞秦汉考古的,其他领域只是偶然涉及,这一领域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位置可想而知。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走向儒术独尊、汉民族和汉文化形成的伟大时期,其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历史长达二千余年。这段历史表现在考古学上,前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猛烈撞击和聚合,后期则是富丽堂皇的主体汉文化阶段性的发展变化。最初俞先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这一领域,除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学需要,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史认识的考虑。

这一研究领域所要探究的问题是如此头绪繁多,而且必然要受到考古资料的限制。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期,他只能将研究局限在秦汉时期的“亭”、“市”制度、都城规划制度和包括丧葬制度在内的礼制方面,并开始了用考古资料探讨秦汉社会性质的尝试。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我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和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他又开始了通过研究秦文化和楚文化去寻找汉文化渊源的探索,同时对这一时期考古资料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俞先生用他那如椽巨笔,饱蘸考古资料的浓重色彩,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战国秦汉的历史画卷。

根据对大量考古资料的分析,俞先生将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秦文化、晋

文化（韩赵魏两周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后来只有齐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12]和巴蜀文化^[13]这七大文化分布区域。在战国早期，除了偏处西南和东南一隅的巴蜀文化、百越文化具有强烈的自身特点和礼制外，其余五支考古学文化都继续沿袭着西周以来的礼制。俞先生通过对这一时期各阶层人物墓葬用鼎制度的分析，发现传统礼制正在崩坏：“诸侯之卿僭用天子鼎制（大牢九鼎）和东方诸国的庶人逐渐普遍使用士礼特一鼎，是这阶段变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前者反映了“代表土地私有制利益的新奴隶主贵族，……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把旧的氏族奴隶主贵族排挤下去”；后者即“庶人可用士礼的深刻意义，在于意味着二者之间等级界限的消失”^[14]。这一时期，楚文化区域面积最大，而且掌握了以“失蜡法”为代表的精密青铜铸造技术，是实力最强大、最有可能同化、取代其他文化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战国晚期的墓葬考古资料显示，东方各文化区域仍然实行着传统的礼制，但用鼎制度更为混乱，表明这种礼制所反映的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到了最后崩溃阶段。秦文化区域则呈现出全新的变化，墓葬中“庶人普遍用特一鼎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发生，连过去比东方诸国更多出现的部分贵族已用陶礼器的现象，这时也不很突出了”，用日用陶器随葬成为风俗，就连规格很高的贵族大墓也只用铜二鼎，很明显，秦文化已经彻底摒弃了旧礼制，实行了二十军功等爵制^[15]。而且秦文化的区域日益扩大，秦军征服到哪里，就把秦文化强制推行到那里。至公元前3世纪末叶，东方各文化区普遍出现了以屈肢葬、随葬日用陶器、墓穴外有围墓沟为特点的秦文化墓葬，而当地旧有的文化几乎突然之间全部销声匿迹。秦人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同时，也靠专制强制实现了文化统一。

现已发现的各种秦代大工程遗迹和近年对秦始皇陵的调查发掘，证明“秦人在土木工程和手工制品方面原来就有喜好巨大体量的作风，在统一六国后更是发挥极致。……其阿房宫前殿基址和秦始皇陵墓的工程之巨及陪葬品之多，远远超出已往的想象，堪称古代奇迹。……所示滥用民力的程度，是当时任何国家都不堪承担的。毋怪乎这样一个财富集中、军事力量空前强大的王朝，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16]。秦俑坑所出大型陶俑手持的实用锋利镀铬铜剑和秦始皇陵西墓道出土的两辆精美绝伦的仿真大型铜车马，证明秦国已将青铜冶铸技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辉煌的秦文化对周边地区特别是日本的文化进程发生了强烈影响。日本古代自进入古坟时代后，建立起国家政权，其显著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周边环境方形水沟的古坟。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在寻找探索古坟的渊源，但始终线索不明。俞伟超先生根据日本弥生时代初期在北九州突然出现的方形周沟墓与秦人的围沟墓惊人相似这一点，精辟地推断这是秦始皇时期东渡日本的秦人移民将这种秦文化葬俗带过去的，这是日本古坟的唯一源头^[17]。这一结论，立即得到日本考古界和历史界的公认。本来，秦文化有可能长期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统一文化，但秦代的短促，打断了这个进程，使两汉时期的文化朝着另一种形态发展下去。

历时长达400余年的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期。俞伟超先生

根据两汉考古资料特别是墓葬考古资料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将汉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汉初的六七十年时间，是汉文化的形成期。此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结构：政治制度、度量衡制度及币制沿袭秦制，所谓“汉承秦制”即指此；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则发源于先秦楚文化的黄老道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包括葬俗在内的社会习俗方面，则是先秦六国文化即本质上周文化的复活。这是汉文化内涵的三个最主要的源头。最初，各地的文化差异还是相当大的，经过统一专制政权下数十年的整合，这种差异逐渐缩小，到汉武帝初期，一个完整形态的汉文化形成了。这一时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基本尚未出现，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逐步加强，由各级政府管理的“亭”、“市”和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的工官，垄断了重要手工业制品的生产^[18]。从西汉武帝至东汉明、章二帝时期，是汉文化的繁荣期。旧有的文化区消失，全国文化面貌呈现惊人的一致。此期中，出现一批世代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家族，形成了新的宗族制度；官营手工业发展到了高峰；对盐铁业的垄断，不仅促进了冶铁技术的提高和铁农具的普及，也极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城市发展到隋唐以前的最高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得到独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丧葬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按氏族宗法制度安排墓位的族坟墓制度，被家族茔地代替；以皇帝、诸侯王、列侯为代表的高官显贵按新的丧葬等级制度纷纷建造规模巨大的坟墓，随葬陶质明器生活用具成为风俗，壁画墓和画像石墓开始流行。自东汉和帝至汉末，是汉文化的衰落期，但其历史特点却表现得更充分，因而也可视为汉文化的最典型形态。此时，经济领域大土地所有制迅速膨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经济加强，各种依附关系日益发展，货币商品经济明显萎缩，官营手工业一蹶不振，私营手工业抬头，城市衰落；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家的“天人感应”世界观和“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使战国以来的神仙信仰深入人心。与这种变化相应，丧葬习俗中新出现了多代葬于一墓和模拟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更为完备等现象，画像石墓、壁画墓、画像砖墓更为流行，祥瑞图和神仙图像成为墓室画像的重要题材^[19]。

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城规划，俞伟超先生作了经典式的研究。他根据积累的都市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都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分散存在，是初期阶段都城的特征；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确立后中国都城发展的第二阶段形态；从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东西两京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是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后封建等级制森严时期的都城形态；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阶段的形态。俞先生认为，处于第二发展阶段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城规划，在我国城市和都城史上地位极其重要，影响中国城市特别是都城规划达两千余年。他将这一时期的都城特点归纳为五点：（1）都有城墙包围，面积一般为二十多平方公里；（2）全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郭城只有一个，宫城往往不止一个；（3）无论是宫城内还是郭城内，都有许多手工业区；（4）郭城内新出现了市，即由官府管理的特定商业区；（5）主要宫殿皆设于

制高点，便于控制全城。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都城规划如此一致，显然有明确的都城设计思想。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将这种都城设计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社，市、朝一夫（郑玄注：方各百步）。”大大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形成这一时期封闭式都城规划的重要原因^[20]。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界见仁见智，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迄无定论。考古界因忙于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没有参加这场讨论。但俞先生却一直审视着这场争辩，并在对大量考古资料深入分析研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21]。他从青铜时代和初期铁器时代农业生产条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适应程度、奴隶劳动价值的历史变化、奴隶数量和奴隶来源的变化、土地所有制的变迁等角度，解剖分析了商周至两汉时期的社会形态。他认为，商周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这个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商代到西周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典型的罪犯劳动奴隶制，春秋时期为两个阶段的过渡期。尽管这一结论并非定论，但俞先生毕竟是用考古学资料去探索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拓荒者，他的这种研究带给我们的启迪将是极为深远的。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俞伟超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构建起了战国秦汉考古学的基本框架体系，而且这一框架体系的科学性正被日益增多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所证明。

三

用考古学方法去探究人的本质，寻觅人类发展进步的逻辑过程，是俞伟超先生学术活动后期的最大学术愿望。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的论述，基于他们对欧洲历史和古代东方历史的分析和研究，这一结论并不完全符合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已经被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否定以后，有必要重新检讨和研究人类进步的逻辑规律。而中华文明这个全世界唯一的没有中断发展过程又自成体系的悠久文化，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最理想的对象。

当俞伟超先生带着这个学术愿望走进人类幼年伊甸园的时候，自然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已将一百多年来由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精心搭建起来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框架体系撞击得七零八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遗传基因技术即DNA技术的研究成果证明，现存人类是20万年前在东非形成的，其前身是东非的阿法种南方古猿，约在距今10万年前后，东非的人类发生了一次大扩散，其中一支约在6万年前来到今天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就是这支东非人的后裔。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全世界各种肤色、各个民族的远古祖先都是东非人，在此以前的一切能人、直立人等人类科的物种，都已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灭绝^[22]。从猿人（能人）到直立人再到智人的人类直线发展

观,一下子崩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那里?幼儿期的人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一重大而古老的科学课题重新摆到了社会科学面前。俞伟超先生知道,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只能诉诸理论的哲学思辨。经过对图腾制的深入理论研究,他敏锐指出,族外婚和行为的文化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族外婚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起点,只有实行族外婚制后,才会“出现族群、家庭、氏族、部落、联盟、国家等社会组织和种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动物则永远不能产生这些组织和观念”。他认为,实行族外婚制,是生活在严酷生存条件下的原始人群为了不被其他人群所消灭,必须与其他人群结成联盟这一生存需要产生的必然结果。族外婚制的出现,应在早期智人阶段,在此以前实行族内婚的能人和直立人只能看成是古猿向人的过渡形态。人类幼儿期普遍存在的图腾制,实际上是实行族外婚制的氏族从血缘关系认同感产生并用以区别其他氏族的命名制度^[23]。当然,这一结论还只是一种假说,但却是一个天才和智慧的科学假说。

族外婚制的实行,不仅优化了人类的体质,也促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社会历史进程明显加快了。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川期过后,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起,在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一些自然条件最优越的河谷地区,被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为“农业文明”的原始锄耕农业蓬勃兴起。其中,北非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农业文明直接发展成为古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直接发展成为苏美尔文明。俞伟超先生在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时却惊奇地发现,尽管其发展进程与埃及、两河流域相近,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在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文化面貌迥异的多支新石器文化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壮大。到距今5000~4000年前后,其中的两支新石器文化发展到了高峰。一支是黄河下游的东夷人的山东龙山文化,其发达的陶器轮制技术、精美绝伦的玉器表明其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而数量众多的城址和相当成熟的文字^[24]象征着这一文化已经走近文明。另一支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柱的良渚文化,其族群酋长墓中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和气势恢弘的巨型宫殿群式的居住遗址,证明了这是发展水平与龙山文化不相上下的一支文化。与同时的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相比,这两支文化的发达程度显然要高得多。如果按照考古学文化一般发展规律,这两支文化当然会迈进文明的门槛,建立自己的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但历史却开了一个令人惊愕不止的玩笑。到了接近距今4000年前时,辉煌一时的这两种文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出现的岳石文化、继良渚文化之后出现的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发达程度远为低下。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不仅使当时的各支新石器文化人类集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历史的发展发生了一次巨大错位。河南龙山文化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一支文化,并在豫西、晋南地区演变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走上了文明发展道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分布面积如此广阔的两支先进文化突然毁灭?俞伟超先生认为,历史上只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巨大自然灾害才能顷刻毁灭一个文化,从当时所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看,还没有哪一个

人类集团有力量发动能同时毁灭两支先进文化的战争，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毁灭肯定由于人类无法抗拒的巨大自然灾变。他推断，这场灾变就是文献记载中记录的发生在尧、舜时期的“洪水滔天”、“下民其忧”的持续多年的巨大水灾。“当洪水泛滥时，大江、大河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大雨还会引起海进，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残存的居民，在相当的时间之内，恐怕只能勉强维持生命，根本谈不上搞什么有关文化的建设了。”“对于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 4000 多年前不发生这场连续若干年的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25]此论一出，立刻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赞同和公认。巨大自然灾变引起的历史错位和人类发展进程的中断，在人类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多，如何正确估价和解释这种偶然事件中蕴涵的历史必然性，俞先生通过这一研究为学术界作出了表率。

为了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规律，俞伟超先生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并结合古史记载，对我国青铜时代各大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进行了高度概括性的研究。他将公元前三千纪至二千纪期间的青铜时代早期各大考古学文化，根据其族属归纳为下列九大集团：（1）伊洛地区的夏文化集团，考古学文化为二里头文化；（2）渤海湾地区的东夷集团，考古学文化为岳石文化；（3）黄河中游太行山以东的商文化集团；（4）内蒙古西部至陕北、山西中部至燕北、冀北的北狄集团，青铜文化众多，共同特征是三足蛋形陶瓮和青铜兽首刀或铃首刀；（5）泾渭先周一周文化集团；（6）甘青地区的羌戎集团；（7）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楚人被称为“荆蛮”，故无论是三苗还是楚人渊源阶段的遗存，可统称为苗蛮集团的文化；（8）东南至南海之滨的百越集团，考古学特点为发达的几何形印纹陶；（9）长江三峡至成都平原的巴蜀集团。在这九大集团中，对中国早期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四大集团，其中夏文化集团、商文化集团、周文化集团自公元前 21 世纪起相继建立了夏、商、周三个我国历史最早的“统一王朝”，而从“苗蛮集团”中发展起来的楚人集团，虽然未曾建立“统一王朝”，却在从春秋中期开始至战国晚期的数百年时间里称霸南方，并企图问鼎中原，其特有的“黄老”道家学说，还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俞先生在分析这四个集团的考古学文化资料时发现，这四大集团都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另一个相邻集团发生过密切关系。例如，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腹地，发现了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而且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的鬲、觚、单耳杯、豆、三足盘、圈足壶等陶器，都源出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出夏文化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不寻常关系。在安阳殷墟的商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北狄集团使用的青铜兽首刀；而在一些北狄集团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很多商式的方唇

袋足陶鬲，暗示商狄两大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样，在陕西的先周墓葬中，发现以瘰裆或联裆为特色的周式鬲与分裆的戎式鬲共存，在丰镐遗址的西周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批戎式洞室墓，说明周文化集团与羌戎集团的关系相当紧密。而在鄂西、湘西北等地大概是楚人先祖的遗存中，发现了本属于百越集团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相当发达，表明这两大集团的关系也很密切。通过与古史记载的比对，俞先生发现这四大集团在建立“统一王朝”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都与相邻的另一强大集团缔结过长期稳定的政治军事联盟，即夏夷联盟、商狄联盟、周羌联盟和楚越联盟，其中商狄联盟和周羌联盟是通过联姻的方式实现和维系的。而一旦“统一王朝”或国家政权建立并稳定后，这种联盟或迟或早会瓦解并由此引发政治动荡。夏王朝建立后，禹一死，夏夷联盟即告破裂，以至东夷族首领后羿赶走夏帝太康，自掌夏政，羿相寒浞又杀羿自立，数十年后，经过激烈斗争，太康之子少康才灭浞复为夏帝。周羌联盟虽然维系时间较长，但联盟的破裂却直接导致了西周王朝的终结。俞先生认为，这种集团联盟，应是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一个规律性现象^[26]。俞伟超先生发现，在四大集团相继建立“统一王朝”和强大政权期间，作为当时最先进科学技术的青铜冶铸技术特别是青铜兵器冶铸技术，被掌权集团当作最高机密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一旦这种技术被其他集团所掌握，掌权集团的“统一王朝”或强大政权就会逐渐削弱萎缩。商代二里岗期，由于商文化集团独掌这种最高机密，势力东达海滨，西至陕甘，北越长城一线，南到长江流域；但到商代殷墟期，由于这种最先进技术被其他集团所掌握，商文化圈迅速萎缩，只局限于今陕西以东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而且对黄河下游的控制也处在紧张状态^[27]。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批玉器中，俞伟超先生找到了 5000 年前集团联盟的信物。在这批玉器中，有一种一分为二、但又可重新拼合的璜形器。这种璜形器又可据其两端所饰图形的不同分为两组。一组是两端均饰虎头，另一组璜形器一端饰鸟首，另一端饰其他动物。俞伟超先生经研究考证后认为，这是功能不同的两种信物，前者是军事联盟信物即后世虎符的前身，后者是不同部族间联姻的信物，并推测这两种信物的持有者为部族首领。这就证明，早在文明产生之前，不同部族集团通过联姻结成军事联盟就已经是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了^[28]。

俞伟超先生极为重视对前文明时期和文明时代早期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认为思想意识是高级性质的物质运动，可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或改变历史进程。在文明时代早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前文明时期，祭祀更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俞先生多次强调，必须重视对古代的祭祀遗迹和祭祀遗物的研究，探索古代人的信仰和精神活动。往往这些遗迹、遗物刚一发现，马上就吸引住了他的研究目光。根据文献记载和甲骨文、金文资料，他将三代及其以前人们信仰的诸神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天地，一类是山川河泽，一类是先祖，并在祭祀遗迹、遗物中寻觅他们的踪迹^[29]。他通过对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和凌家滩、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确认在

前文明时期，诡秘的萨满教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对天地之神和生育之神的信仰已经普遍发生。他从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的位置、规模及所出裸身女神陶像推断，这是红山文化某个部落联盟的祭坛，祭祀对象既有土地之神地母，又有生育神或农神^[30]。在凌家滩大量玉器中，他识别出了用于早期龟卜的由背甲和腹甲组成的玉龟甲，证明了当时巫卜之风的盛行；同时，他还根据一件玉牌上的太阳树叶纹图案，推测其为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推测另一件树叶形玉件为社神即地母的象征^[31]。他还通过对良渚文化大量玉琮图案的研究，确认玉琮外侧四角琢出的两个圆形凸起，实际上是地母神高隆双乳的余痕，但仍然是地母神的象征，这与“黄琮礼地”的古代祭俗完全相符^[32]。这些祭俗，几乎被夏、商、周三代全盘继承下来，不过更加礼制化罢了。对古代祭社风俗深有研究的俞先生，在江苏铜山丘湾的立石杀殉遗址刚一发现，立刻就著文指出，这是商代东夷人的一处社祀遗迹^[33]；对连云港将军崖的立石岩画遗存，他实地观察后也作出了同样的推断^[34]。他在观察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鎏金大铜树后，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商代蜀王在王社中社祀时使用的社树^[35]。对三代青铜器上铸出的诡秘图像，俞先生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他运用排除法，确认了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饕餮纹即兽面纹，就是甲骨文中“帝”即天帝的形象；他还通过对两件出自长江中游的“虎食人卣”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器形的图像表现的是人虎交合，虎形占据主导地位，应是甲骨文中记述的商代“虎方”的祖神形象^[36]。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面具和人头像，俞先生根据最大青铜人面具的柱状突出双目与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目纵”相合，推测他们是蜀人历世祖神之像^[37]。这样，中国前文明时期和文明时代早期的诸神信仰就大体被我们所了解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俞伟超先生从思想家的高度，用粗犷的线条，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人”从诞生到走进文明的前进轨迹。如果俞先生不过早地逝世，这条轨迹线将会画得更加精巧和完美。

需要指出的是，俞先生的学术贡献绝不限于考古学，对于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学，都卓有建树。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用生命和智慧为自己熔铸了一座巍然屹立的学术丰碑。他的学说和著述，必将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永传后世！

注释：

- [1] 曹兵武、戴向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2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2] 《三门峡漕运遗迹》——黄河水库考古队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丛书第一号，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3] 张承志：《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考古学是什么》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4] 《秦汉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2期。
- [5] 《追求与探索》，《文物》1984年1期。
- [6] 《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丛书第一号，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 [7] 《周代用鼎制度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1、2期，1979年1期。
- [8] 《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 [9]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0年3期。
- [10] 《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68~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11] 《长江上游古巴蜀信仰及其文化背景的探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29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12] 《中国考古学中夏、商、周文化的新认识》，《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13] 《三峡与四川考古新收获以及对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32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14]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99~10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
- [15] 同注[14]，105~107页。
- [16] 《秦汉时代考古》，《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7] 《日本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2期；《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古史的考古学探索》359~3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18] 《秦汉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2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
- [19] 见《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与《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80~19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0]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2期。
- [21] 《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81年5、6期。
- [22] 《考古学体系与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27~4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3] 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1期。
- [24] 《丁公陶文是已亡佚的东夷文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08~11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5] 《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14~11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6] 《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24~13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7]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138~14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 [28] 《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古史的考古学探索》95~10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